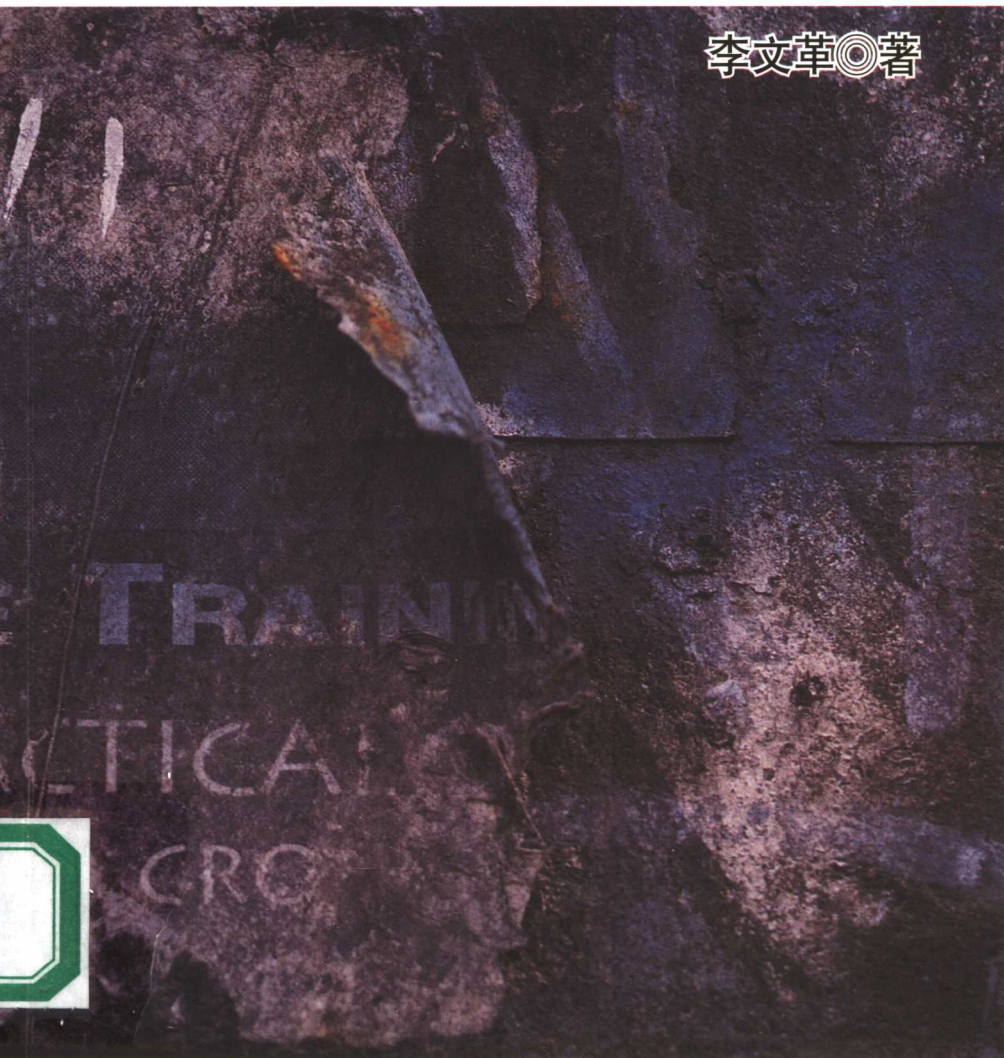


西方翻译理论 流派研究

李文革◎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西方翻译理论 流派研究

李文革◎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西方翻译理论流派研究/李文革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8

ISBN 7-5004-4617-9

I. 西… II. 李… III. 翻译理论—流派—研究—西方国家 IV. H0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78698 号

责任编辑 汪民安
特约编辑 符佳
责任校对 李云利
封面设计 任菊华
版式设计 李建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电话 010—84029453

传真 010—84017153

网址 <http://www.csspw.cn>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装订 丰华装订厂

版次 2004 年 8 月第 1 版

印次 200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12.375

插页 2

字数 294 千字

定价 2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代序：昌明传统，融化新知

——迎接中国翻译学派的春天

翻译是人类文化交往的常见形式，中外古已有之，今日则格外昌盛。然而，虽然翻译作为一种活动早已为人们所重视，但作为一门科学为学界所关注，却历史不长。如此，正应了心理学的一句老话：“历史悠久，学科年轻。”

大体说来，在中国，翻译作为学科提出来，乃是 20 世纪最后 20 年的事情。据学界有的同志考证，中国的翻译学，或者有关的研究，在短短 20 年间，经历了西方几个世纪的历程。这一说法，虽有鼓舞人心的作用，仔细考察，却未必尽合乎事实。倘若如此容易，如此神速，又为何谓中国翻译学的建立如此步履艰难，为何谓中国翻译学派的诞生如此姗姗来迟！

让我们先来回顾一下西方翻译理论走过的主要历程。

西方的翻译理论，若作以粗略的划分，大体可以说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语文学阶段：语文学是一个古老的名称，可以概括大约现代语言学诞生以前漫长的历史时期西方世界翻译活动的一般情况，包括古希腊罗马、中世纪、文艺复兴和所谓近代欧美各国的翻译。其特点是以《圣经》《荷马史诗》《莎士比亚剧作》等宗教和文学经典翻译和转译为主要活动，按照经典文本解释的

语文学传统形成了比较零散而带有经验性的翻译理论，例如关于翻译标准和风格传译问题的讨论。不过这些讨论，虽然尚不能成为系统的学科架构，却已经有了一些规范性的思维特征，而且在某些方面触及到翻译的本质。

第二阶段，结构主义阶段：结构主义虽然是一种哲学思潮和思维方式，和法国惟理派哲学传统关系密切，但在这里主要是一个语言学概念，即以现代语言学（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建立为起点，而以将语言学理论用于讨论翻译问题并作为翻译的理论基础为基本特征（例如雅格布森的翻译理论）。但是，结构主义的翻译理论并不是纯粹的结构主义理论，而是比较有系统框架同时又融合了其他学科知识的翻译理论，例如，奈达的翻译理论，尽管和他的《圣经》翻译活动不无关系，但却是带有明显的结构主义的理论特征，同时也吸收了工程学、信息论、文化学等理论的精华部分融合而成的。因此，今天谈论西方翻译理论的时候，“结构主义”一词仍然是一个并非贬义的学术词语。

第三阶段，解构主义阶段：解构主义是对结构主义的反叛，属于后现代主义的一个重要派别，几乎可以用来代表后现代主义的理论精神。那就是拒斥形而上学、反对中心和权威、包括破除语言中心论和人类中心论的观点，提倡解构文本、解构殖民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以及运用描写主义的方法而和结构主义的规定性方法相对立并超越之。但是，结构主义在翻译理论领域的表现，由于文化转向、语言转向、文本转向等因素的介入，而变得异常复杂多样，是不可以一概而论的。这里有的是解构主义与解释学、现象学的结合，有的是解构主义对于西方文化中心论或男权中心论的消解，有的甚至是翻译与比较文学和文化学的结合等等。充其量，解构主义只能是一种理论导向、一种价值观念、一种学术思潮。它在消解传统和主体的同时，也最终会消解自身于多元化的翻译理论建构之中。

尽管如此，西方翻译理论在经历了漫长的传统阶段之后，已经取得了十分辉煌的成就，却是毋庸置疑的。学派林立，高潮迭起，也是担当得起的。事实上，中国的翻译理论，如果说和西方传统译论一样同样经历了漫长的古典时期的话，却是在近年来才关注翻译学科和理论建设的，其理论建树和学科成就，仍然没有脱离草创和借鉴阶段，难免显示出一些荒芜和杂乱。

回顾这一过程，必要时和邻国苏联的情况加以比照，总结一些经验教训，想必是有益的。

中国的传统译论，诚然有着丰厚的文化底蕴和美学特点，但长期隐藏在朦胧的经验性思维的面纱背后，不见真相，难放光芒。所以，当新时期开始的时候，像多次历史上类似的机遇一样，伴随着思想解放的运动和学术自由的启运，介绍风靡一时的奈达理论和提倡翻译学的建立，作为对严复“信达雅”观念的桎梏突破（且不说“信达雅”百年来有过多少理论变体），就一起来临。这曾经是一个激动人心的阶段，有着许多要学的东西和想学的东西。伴随着奈达的来华讲学和奈达书籍的翻译出版，奈达理论在客观上起了超脱直译、意译争论的老话题的催化剂作用，但其后中国译界遂陷入了科学艺术之争的二元对立的老套路而不能自拔。很快的，奈达被怀疑、被质问、被批判、被抛弃。除了金隄先生的《等效翻译探索》，以自己的“等值论”替代了奈达的“等效论”之外，已经很少有什么反应了。因为在许多中国翻译理论家看来，文本是翻译之本和译者的本分，而阅读效果是不能测量的。这在缺乏科学主义传统和实证操作精神的中国翻译界，也不足为奇，读者反应要么是各行其是（由于读者的多样性），要么是无法掌握（由于统计的无效性）。

在本族文化一方看来是言之成理的地方，也包括了否定奈达的其他理由：

1. 奈达理论是西方的，不适合中国，尤其是没有考虑到汉语和印欧语言的差别。

2. 奈达理论是建立在《圣经》翻译经验基础上的，不适合宗教典籍以外的翻译。

3. “动态对等”无法实现，不科学；“读者反应”无着落，也不科学。

4. 奈达理论是结构主义的翻译理论，在解构主义面前已经过时了。

在关于奈达理论的零碎的争论中，有人说中国译学成熟了，有人说中国译学仍然幼稚，但是一个基本的事实是：中国译界迄今未有一部关于奈达理论的系统研究的专著（介绍性书籍不在其列），也没有一种“理论”企图把奈达理论的某一部分或某些要素或某些做法纳入其中，即以某种形式加以借鉴和融合。可见我们的理论意识和理论建构能力真的是又小又弱。

但这一例证，尚不足以一概说明近年来接受西方其他翻译理论的情况（但愿也不仅仅是一个特例）。值得一提的是，在同样以文学翻译和文学翻译理论为主的非西方传统中，比如说，在俄罗斯环境下，在西方翻译理论进入的时候，或者说主要是现代语言学理论对翻译发生影响的时候，却产生了语言学派和文艺学派之间很有意义的论争，大大地推进了俄国现代翻译研究的发展。它表现出下列特点和标志：

1. 就翻译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例如翻译的性质和可译性问题，展开了认真而富有成效的理论论争。

2. 争论持续了一定的时间，形成了相当的规模，吸引了主要的理论家参加并产生了各自的代表人物和代表作品。

3. 进一步推动了翻译的语言学派和文艺学派自身的发展，

产生了后续的理论研究成果，例如在散文和诗歌翻译、语体和语义翻译等领域。

别的不说，就这些，在我们面对几十年来国内翻译学讨论所取得的区区成就而言，就是值得羡慕和学习的。事实上，俄国的学派论争，构成了西方翻译学由古典向现代转换的一个合适的逻辑环节，弥补了西方翻译学史的一个理论空缺——如果把俄国也看作是属于西方而又有别于西欧和北美的话。

前不久有人提到中国学派，不是作为已有的存在，而是作为可行的问题，提出来讨论。言外之意是：中国没有翻译学派，为什么？

这当然是一个和西方翻译理论研究不无关系的重大问题。但是，欲回答这个问题，先要明了为何西方如此学派林立，观点迭起？

我个人认为，有以下几点原因：

1. 西方是一个统一的犹太—基督教传统下的多民族国家和多语言文化的多样统一体；

2. 西方有良好的社会规范和学术规范，包括人类创造力的学术激励和智源供应系统；

3. 有利的学术自由和思想自由，包括知识产权的尊重和发表机会的增加不容忽视；

4. 在西方，科学和人文传统是同样的发达，而且二者之间可以互相借鉴、吸取和促进；

5. 频繁的跨语言、跨文化的交流（国内的或国际的）直接促进了翻译活动及其理论研究。

这是大环境，具体而言，还有如下的翻译理论学派产生的直接条件：

1. 一般不追求“翻译学”这样全面的学科体系，而是立足于具体的问题研究；

2. 研究者往往具有不同的知识结构和职业背景，其语言、思想和方法绝不雷同；

3. 不同背景相同志趣的研究者共同工作，相互探讨，容易彼此沟通和激发思想火花；

4. 发散性思维和异向思维，批判性和吸收性创造，是理论创新的基本途径和经验所在；

5. 长期在一个领域内坚持研究，若有发现，敢于先发表出来，然后再求完善和系统化。

反过来思考问题，就可以发现我们目前仍然缺乏一些建立学派的条件或要素：

1. 学术规范没有建立起来，大量重复而缺乏创见的文章和书籍充斥于学界和课堂；

2. 可以借鉴的其他理论来源不像西方那样多，例如语言学和文艺学的理论流派贫乏；

3. 趋同思维，教条套用，缺乏理解力、批判力、创造力的情况即使在职业译论家那里也很普遍；

4. 喜欢大而全的理论体系和框架（忽视理论对现实问题的关注），而不能长期致力于一个问题的研究而获益处，即没有独立的研究领域和持久的研究课题；

5. 学界互相封闭，缺乏必要的沟通和借鉴，或者只有形式主义的开会式的交流，而无实质性的交流，即不能利用他人智慧进行创造性思维和独立的理论创造。

笔者以为，只要能够克服上述条件和因素上的不足，就有可能建立中国翻译学的理论流派。当然，这样做也不是很容易的。其实，是否能够建立中国翻译理论的流派，作为终极目标或者努力的方向，虽然很重要，但是对于目前如何借鉴西方翻译理论流派，实际上并无直接的了不得的关系。这样说的目的，无非是想引起在谈论借鉴西方翻译理论的时候，首先关注一下中国自己的

翻译理论和译学传统，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避免急功近利的创造和拿来主义的态度。

西方的翻译理论流派，对于我们目前的甚至将来的译学建设，究竟有什么样的关系，或者说到底应当怎样来看待以至于利用这一笔财富？我以为下面的途径或方面不容忽视：

1. 把这些翻译理论作为现成的理论研究成果，接受下来，引入课堂，当作知识传授，造就人才，使之成为理论创新的前期基础。

2. 把这些翻译理论看作西方文化和学术研究的一个环节或阶段，并在人类知识总体发展中去认识西方译论的方法论意义及其所达到的高度。

3. 研究这些翻译理论在何种程度上或者在哪些方面可以为建设中的中国翻译理论所吸收和借鉴，以便最终创造出自己的翻译理论和价值体系。

若是靠近中国翻译理论本身的发展问题，即中国传统译论如何在与西学的融通中求得新生的问题，则思路会略有变化。在这一方面，抽象而笼统地谈论中西结合是无用的，甚至援用已有的体用关系模式来套用也是无益的。我这里提出一个基本思路，即借助比较文学的研究思路，提出在中国传统译论和西方现代译论交融的过程中，进行理论上的相互阐发，互相发明，以期对中西译论的认识在学术互动中加深和扩展。在这个意义上，西方的翻译理论与中国翻译理论的关系也是多维的，如同西方理论本身就是多维的一样。

具体说来，可以采取的策略和做法如下：

1. 以西方现代译学和哲学的框架为参照框架，对于中国传统译论中的相关问题进行清理，从中寻找相关论题，加以理论阐释，加以条理化和明晰化，以便形成和国际译界对话的资格。例如“五失本，三不易”作为本体论问题，“信达雅”作为翻译标

准问题，等等，其中有的要先进行命题转换才能进行理论操作。

2. 把中国传统译论中最有价值和特色的理论加以整理，进行提炼加工，主要是在原理基础上增加演绎系统和合理地逻辑推演，使其具有现代译论的明晰性特征和生机勃勃的时代精神，或者成为现代译论的一部分，例如，“文质”问题、“神似”问题、“化境”问题、“译味”问题，等等。

3. 从中国传统译论或者文论中吸取可用的概念，对于西方现代译论中相关问题进行对等阐释，发掘其中的隐秘意义，以便形成中西文化资源上的最佳结合。例如，可以利用中国传统文论中的“互文见义”、“旁征博引”等机制，对于西方的“互文性”概念加以深入阐释，丰富之，深化之，中国化之。

4. 借助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某些概念，例如老子的“道器”、“有无”，儒家的“诚”、“仁”，佛家的“如”、“相”等思想，对于西方现代哲学、文论和译论中相关的基本问题进行阐释，例如翻译起源问题、翻译本体问题、主体客体及其关系问题、主体间性问题，以及语言问题，使其具有东方哲学的博大精神而不显得过分条分缕析和支离破碎。

5. 利用国学中的训诂学优势和西方的语言学、解释学相结合，用佛学的世界观原理和西方的现象学相结合，用先秦的《公孙龙子》和《墨经》名学和西方的语言哲学和逻辑语义学相结合，用中国的诗学和西方的诗学相结合，用中国传统的文章分析和西方的语文学和篇章分析相结合，等等。这样可以形成相互对接的中西现代学术的统一基础，作为译学的理论资源和思路启发。

6. 最后，用中国翻译史上的典型事例为例证，对西方重要的翻译理论和假设进行验证。或者把西方某一重大的翻译理论，用于研究中国翻译史的分段或整体，以便深入理解中国翻译史本身，或者通过实证研究检验现有理论的普适性和局限性。例如，

运用伊万·左哈尔的多元系统理论，来关照中国翻译史上的四次高潮，可以收到理论检验和历史认识两个方面的兼通效果。

我想，如果这样做了，中国翻译学领域最终一定会有进步和成就。对此，我深信不疑。

正是在这样的学术大背景下，要我转而谈论这本《西方翻译理论流派研究》。

其实要说的话，大部分都已经在前面说过。最后一些重要的话，是关于这本书和他的作者的一些情况和看法。

本书的作者李文革同志，是我在西安工作时的硕士研究生，也是我的开门弟子。当时我的研究方向就是中国文化典籍翻译和翻译理论研究，开的课比较多。政治和二外不算，专业课和专业基础课中除了文学和古汉语分别请外语系和中文系的老师来上，其余主要的课几乎全由我自己上，包括语言学理论、中西翻译史、中西典籍翻译、跨文化传通，以及翻译理论等。文革是系上的青年教师，立志要攻读硕士学位，教学之余上研究生课程，写论文，还要照顾家务和孩子，很是繁忙。但他学习刻苦，从不落课，也不拖作业。毕业答辩以后不久，文革去了新加坡留学，我也离开西安，到了天津。文革对于理论的兴趣本来就很大，这次利用国外深造的机会，一面选修课程，一面收集资料，为撰写这本《西方翻译理论流派研究》倾注了大量心血，做了充足的准备。而我在学术交往日益扩大的同时，和西安的学生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看到他们的进步，比如，谁又发了文章，就很高兴。迄至文革把一本完整的西方翻译理论流派的书稿捎给我，并嘱我写序，我便应承下来。

写序是一件难事，况且我知道同类书籍在国内外已有先例。一本是美国翻译理论家根茨勒的《当代翻译理论》，流传颇广，并且出了修订版，惜迄今尚无中译本。另一本是廖七一教授编著的《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探索》，《中国翻译》有书评，在国内尤其

有影响。但是我还是觉得，在一个西学东渐即中国需要颇多借鉴西方的时代，在中国翻译学正在紧锣密鼓地积极建设的时期，介绍和评述西方翻译理论的书籍，仍然是多好于少，而且愈精愈好。何况这本《西方翻译理论流派研究》除了有鲜明的特色之外，仍然是少数几本具有先进性的西方翻译理论流派研究专著之一，对于国内学界了解西方翻译理论的发生和发展，以及在理论上的继承和借鉴，都是有积极意义的。

就我所知，文革的这本书，属于陕西师大人文社会科学重点课题，也是他在给研究生一面上课一面撰写完成的，其中有些章节曾作为教材试用过，收到了良好的教学效果。对于作者的编写原则我是十分赞成的，例如，宏观与微观的设计、重点与全面的顾及、理论同异的辨析、源流交代的清晰，以及介绍与评论相结合的写法。尤其是要在有限的篇幅里贯通西方两千多年的翻译理论史实，勾勒出发展的大势，基本上坚持了厚今薄古突出现代的思路，而又能条理清晰安排得当，是不容易的。另一方面，在力图认真准确地转述西方翻译理论的同时，作者自己对于各派理论的认识和评论，往往给人以提醒和启发，有些地方甚至表现出相当的研究深度，闪耀出理论思维的智慧的火花。

尽管如此，作为一本具有开拓性的理论研究专书，要它在取舍和评论上处处精当，仍然是过高的要求。对于一位独立撰写第一本书的年轻学者来说，有些成长中的缺点，原本是可以原谅的。只要想一想我国目前翻译理论的术语仍然不够统一而又亟待统一，而作为翻译专业，这原本是一件多么不能原谅的事情！而且在读者一方，由于不同的学术背景和翻译观点，对于有些一时拿不准的理论，即便会产生见仁见智的看法，我认为也是正常的。在学术问题上，我特别不能认同于统一思想一类说法，或者动辄用达到共识来框架思想，也未必有利于学科的发展。随着理论研究的深入和新材料的发现，以及中国翻译理论本身的发展变

化，有些西方理论需要进行重新认识和评价，也是完全可能的。

本书的适用范围，我想应当包括那些需要了解国外翻译理论的过去和今天的广大读者，以及那些具有一定的翻译学科基础而力求进一步发展学业的青年读者，对于专业的翻译理论工作者和研究人员，想必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如果读者能够和同类书籍参照阅读，最好是能够参照原文仔细阅读，则收获会更大。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如同我们在理论探讨和学术研究的一切问题上一样，发展的眼光始终是需要的。我衷心地企望，本书能在广大读者和西方译论之间搭起一座桥梁，一直通向中国译论学派的辉煌的前景。

在2003年新春到来之际，让我们从这里开始，努力昌明国学，融化外来新知，以新的姿态迎接中国翻译学派的新春的到来！

王宏印

2003年春节前夕南开大学

目 录

代序：昌明传统，融化新知

——迎接中国翻译学派的春天	(1)
---------------------	-----

第一章 西方翻译理论和流派概览

(1)

第二章 翻译的文艺学派

(11)

第一节 20 世纪以前西方翻译的文艺学派	(13)
----------------------------	------

第二节 20 世纪西方翻译的文艺学派	(33)
--------------------------	------

第三节 20 世纪以前俄国翻译的文艺学派	(44)
----------------------------	------

第四节 20 世纪前苏联翻译的文艺学派	(55)
---------------------------	------

第三章 翻译的语言学派

(68)

第一节 布拉格学派与雅可布逊	(70)
----------------------	------

第二节 伦敦学派与卡特福德和纽马克	(76)
-------------------------	------

第三节 美国结构学派与奎因	(106)
---------------------	-------

第四节 交际理论派与奈达和威尔斯	(111)
------------------------	-------

第五节 德国功能派与诺德	(137)
--------------------	-------

第六节 前苏联的语言学派与费道罗夫 和巴尔胡达罗夫	(147)
------------------------------------	-------

第四章 翻译研究学派	(172)
第一节 早期翻译研究学派与霍姆斯	(176)
第二节 多元系统学派与埃文 - 佐哈尔	(184)
第三节 描写学派与图里	(191)
第四节 文化学派与勒弗维尔和巴斯奈特	(205)
第五节 综合学派与斯奈尔 - 霍恩比	(229)
第六节 女权主义、“食人主义”和后殖民主义 翻译研究	(235)
第五章 翻译的阐释学派	(248)
第一节 两种翻译途径与施莱尔马赫	(251)
第二节 阐释学翻译模式与斯坦纳	(255)
第三节 阐释学理解观与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	(263)
第六章 翻译的解构主义流派	(275)
第一节 “异延”解构主义翻译思想与德里达	(277)
第二节 “纯语言”的解构主义翻译思想与本亚明	(290)
第三节 解构主义翻译策略与韦努蒂	(302)
第七章 美国翻译培训班学派	(315)
第一节 翻译培训班的理论基础与理查兹	(317)
第二节 细节翻译理论与庞德	(322)
第三节 翻译的矛盾观与威尔	(331)
第八章 法国释意理论派	(338)
第一节 释意理论的基本问题	(340)
第二节 翻译程序与翻译评价标准	(344)

第三节 释意理论与翻译教学	(349)
主要参考文献	(357)
后记	(374)